

【统战工作研究】

# 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成因问题的思考

周燕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71)

**摘要:** 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许多学者都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是建立的必要性,二是建立的可能性,认为只要把这两方面交代清楚,统一战线的形成就一目了然。笔者在长期研究中发现,仅仅这两个方面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为从必要性、可能性过渡到现实性还需要一些条件。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它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相互让步、坦诚相待。

**关键词:** 统一战线;必要性;可能性;相互让步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3)01-0074-05

## Reflection on the Cause of United Front for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ZHOU Yan-lai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united front for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has been stated by many scholars from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e is necessity, the other is probability. It is assumed that the cause becomes obvious if the two aspects are explained clearly. The author, after long-term study, thinks that the two aspects alone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at all,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necessity and probability to reality requires other conditions. The core condition is the mutual concession and open-hearted treatment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other social classes, ranks and groups.

**Key words** united front; necessity; probability; mutual concession

### 一、建立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略

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无产阶级战胜敌人的基本武器和三大法宝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统一战线,是指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各个时期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本阶级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并同其他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及一切可能力量,在一定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同盟军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以便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

这是马列主义革命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不但应该建立统一战线,而且也有条件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统一战线的真正形成还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其它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共同努力,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大局为重、相互让步、待之以诚。可以说,没有让步,就没有统一;没有坦诚,就没有长久。当然,这里所说的让步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首先,必须是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其次,不是一味的、无原则的讨好对方,从而变成对方的尾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两次国共合作正是在可能性、必要性的基础上,由于双方的坦诚相对、相互让步而变成现实并得以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把自己的工作重心定位在发动城市工人运动上,并于 1921 年 8 月在上海成立公开做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1922 年 1 月到 1923 年 2 月,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 13 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 187 次,参加人数 30 余万。但是,除少数稍具成效外,几乎所有罢工都遭到北洋军阀的破坏和镇压。特别是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在京汉铁路制造的“二七”惨案,更使工人运动遭受沉重打击。“二七”惨案后,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除广东、湖南外,都遭封闭,工人情绪一时趋于消沉,全国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显示了这个阶级的强大力量,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同时,血的事实也表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单靠工人一个阶级的力量,难以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只有团结全国人民,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才有取胜的可能,这就使无产阶级认识到必须建立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孙中山领导的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国民党,虽然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但它却屡战屡败,几经挫折,实力大损,而且自身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缺陷,如成份复杂,严重脱离群众等。面对这种状况,孙中山痛定思痛,深感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开始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真诚欢迎共产党同他合作。也就是说,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会有革命要求。这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统一战线并不会因为上述两点而自然生成,它还需要国共两党双方的共同努力。

## 二、坦诚相待和相互让步是统一战线形成的基础

早在 1922 年 6 月二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就发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取消列强在华治外特权、肃清军阀等十一项原则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同年 7 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案,提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

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同时又指出,“在民主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sup>[1]</sup>。可见,在这一时期,共产党是决定以党外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却遭到国民党的拒绝,孙中山不同意两党对等的党外联合方式,只同意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回忆道:“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什么。他在我们没有组织中共以前,明知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后成为中共要人的朋友们说过,既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事,也有同样的解释,仿佛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他在大圈子外面。”<sup>[2]</sup>国共两党双方观点发生了严重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及其当时驻华代表马林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 1920 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决议》第十六条之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对于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都是必须执行的”;再加上“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取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sup>[3]</sup>等因素制约,中国共产党肯定是要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指令,这实际上就为马林的活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尊重历史,不论方式如何,马林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斡旋,也许就没有第一次统一战线。我们仍然以张国焘的回忆作为证明:“大会(中共二大)闭幕后几天,马林回到了上海(1920 年 8 月,列宁委派马林为共产国际正式代表赴中国,但马林未能成行。1921 年 6 月,马林到达中国并出席了中共一大,同年 12 月在桂林与孙中山会晤。1922 年 7 月马林回到莫斯科,提交了《给共产国际执委的报告》,在分析了国民党的构成和性质后,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加入国民党,改造国民党,但同时要保持共产党自身的独立性。这一思想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成。同年 7 月 27 日,马林再次来到中国,这里所说的回到上海,就是此时)。他对于中共建立政纲的努力浇上了一盆冷水。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在一次我们与

马林的会议上,他说明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去。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他提议,中共中央不妨再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无人赞成他的主张。尽管如此,1922年8月初,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约三星期,另一次更重要的会议在西湖举行了。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和我共七人。这次为时两天的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虽然没通过甚么修正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议案,但著名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就是这次会议确定的,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马林是这次会议中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但还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的论点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和民族的革命,绝不能有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时。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高尚德、蔡和森与我发言反对马林的这种主张。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意见。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他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sup>[12]</sup>尽管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党内合作怀有疑虑,但杭州会议还是确立了这种形式。接下来的问题就

是说服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恰在此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叛乱,“这使孙中山一时几乎丧失一切,北方的实力派吴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的支持陈炯明。国民党分子背离他的也不少,特别是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王宠惠等49人联名通电请他下野,给他的打击更是不小。这个时候,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实孙先生为之感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sup>[12]</sup>

1922年8月13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他。孙先生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原则改组国民党。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共产国际的协调、斡旋下,国共双方都做出了适当的让步;中国共产党同意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国民党也要立即进行改组,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才变成现实。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大局为重的思想,没有相互的妥协和让步,即使双方都能认识到建立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也很难真正结成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然也不例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同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组成下层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1932年4月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作战,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解放和独立。”但由于这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相对弱小,无力独自承担起抵御外侮的重任,因此,就有必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其它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当时中国的其它阶级和政治派别究竟愿不愿意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不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发生了分裂,国民党政府中的亲英美派也有抗日要求。毛泽东说:“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尽管这不过是大狗小狗咬狗饿狗之间一点特别有趣的争

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sup>[3]</sup>可见,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的前提下,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民族革命的营垒得到扩大,这就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可能性要变成现实性,当然也离不开国共两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积极让步、坦诚相对。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任务》一文中曾经讲过:“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即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这些保证是必须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sup>[3]</sup>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他又指出:“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取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sup>[3]</sup>

综上所述,两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在必要性、可能性基础上,完全得益于双方的坦诚相待、相互妥协和让步。

### 三、中国社会特点和阶级结构是统一战线形成的基本条件

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社会特点和阶级结构所决定的。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由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决定的。旧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中间阶级。无产阶级尽管革命性很强,是最有觉悟、最有组织性、纪律性的阶级,但它的人数很少,五四运动前,产业工人只有200万,占全国人口比重不及百分之一,力量较弱;地主大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也不多,但它掌握着国家政权,又有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力量相对较强。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再加上民族资产阶级,即处于无产阶级与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阶级力量占着绝大多数。因此,无产阶级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依靠广大农民,团结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其次,是由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规律和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决定的。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和敌我力量的不平衡导致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没有起来或发展得很慢。要把这种不平衡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气力。正确的策略路线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放弃关门主义,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壮大自己,削弱敌人,使敌我力量的对比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压倒敌人,夺取全国胜利。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错综复杂:既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又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和斗争,使得阶级关系趋于复杂化,从而就为共产党利用这些阶级之间的矛盾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提供了条件。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大资产阶级相互勾结,残酷地压榨、剥削、奴役劳动人民,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除无产阶级外,农民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革命民主派,革命要求强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完全可以和农民阶级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小资产阶级也有很强的革命要求,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重要依靠力量;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具有一定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但只要它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有革命要求,可以

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应该将它们吸引到自己一边;“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共同统治的半殖民地社会,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以不同帝国主义为背景,在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时,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针对某一个帝国主义时,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sup>[3]</sup>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不断增强,逐渐打破了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维持的均势统治,遭到美、英等国的不满和反对,依附于美、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一部分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由于本集团利益的需要,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

党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条件下尽可能的保持。

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大胆创新,敢于突破,切莫人云亦云。

#### 参考文献:

- [1]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资料选编(1919-192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
- [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上接第60页)

同形式的投资活动,为增加学校收入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一些高校对投资缺乏风险意识,论证不足等原因,形成投资失误,给国家和学校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有鉴于此,第一,高校的各项对外投资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对外投资的决策机制和程序必须依法进行,形成行之有效的工作规范。在对外投资的决策过程中,应当吸收会计人员参加,必要时聘请会计中介机构参与投资的可行性和投资效益的论证。第二,高校应建立对外投资决策集体审议联签责任制度,防止对外投资决策失误和不讲科学的个人专断,避免重大投资损失无人负责的现象。第三,加强投资项目的立项、评估、决策、实施、投资处置等各环节的会计控制和审计,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 三、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建立资金业务的监督检查制度

高校应健全内部审计机构,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建立资金业务的监督检查制度,这不仅是前文述及的财政部两个规章的要求,也是《会计法》和《审计法》的要求。高校内部审计部门不仅应对资金的真实性、完整性、资金收支业务的合法性,以及资金核算、帐务处理的正确性进行严格监督,还应对学校投资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程序以及投资项目的会计核算、投资收益、投资管理等情况进行定期审计或审计抽查,对内审发现的问题必须严肃处理。如高校的内部审计可采取定期审计措施,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审计部门对该年度所有会计业务进行审查,对资金核算、帐务处理的正确性进行监督,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内部会计控制的薄弱环节应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和完善。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可开展基建项目、修缮工程项目审计。以某高校2001年度为例,审计部门共审计工程项目158个,审计总金额168379116.68元,累计核减资金10848010.27元,降低了工程项目成本,为学校节约了大量的建设经费。

《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作为新《会计法》的重要配套规章之一,属于强化单位内部管理的范畴。高校只有建立起严格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对于重大决策和重要经济事项的职权权限形成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的机制,才能做到管理科学、防止舞弊、不做假帐,真正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 参考文献:

- [1] 刘玉廷.内部会计控制规范——新形势下加强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里程碑[J].会计研究,2001,(9).